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问题研究

李晓峰,郑秉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为了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差异,理清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金融服务业的演进趋势,探究中国金融服务业与其他国民产业部门的关联关系,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以及产业关联系数,在当前中国处于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下,尝试从比较结果中得出如何深层次地深化金融改革、如何进一步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关联关系并探索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验。鉴于金融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和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采用 WIOD 数据库中中美两国 2007~2014 年的 9 个行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对两国金融服务业以及整体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产业关联系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及美国;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系数均大于中国,反映了中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不足。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应推进深层次金融改革、加大服务业投入占比等,以让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词:产性服务业;金融业;产业关联系数;投入产出表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8)03-0068-08

Correlation of the financial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LI Xiao-feng,ZHENG Bing-kun

(Economics and Trade Colleg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between

收稿日期:2018-03-1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GD17XYJ14)

作者简介:李晓峰(1962-),男,陕西宝鸡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arif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fter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other national industrial sectors, how to deepen financial reforms in depth, how to further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explore how they can better serve the real economy were drawn from the comparison result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eriod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China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te investment rate and indust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w of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and stabiliz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input and output data of the nine industry secto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7 to 2014 in the WIOD database were used, and the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ntermediate input rate and indust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i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dust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inancial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China, reflecting the gap and deficiency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producer servic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should promote deep financial reforms an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ratio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o tha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an better serve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industr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put-output table

当代经济最要的血脉为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稳定驱动力之一,近年来愈发凸显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它的发展程度和中国各部门经济发展都息息相关,随着金融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不断完善,其从资本筹集、信息披露、资源再分配、风险揭示、公司治理水平以及投资消费拉动等各方面都充分满足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全方位要求。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就需大力促进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和金融体制的逐渐健全,中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长久而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金融服务业生产值大幅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金融业年增加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截至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已达6.21万亿元,显示中国的“龙头”产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成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金融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复杂关联决定了

金融业的重要地位,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其作为现代信息的产生、传递和使用的属性愈来愈明显。

目前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Wind宏观经济数据库统计,截至2017年末,债券市场总体规模为68.76万亿,股票市场总体规模为58.98万亿,而仅2017年美国普通股股票承销额为近2000亿美元,债券发行额总计达7.31万亿美元;中国的证券市场从1990年和1991年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成立为标志才开始发展起来,而美国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证券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其业务范围覆盖股票债券承销业务、兼并收购业务、经纪业务、做市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自营业务、资本中介业务以及其他金融创新产品(CMBS、REITs等)等所有领域,而中国证券业收入仍以传统经纪业务、证券承销为主,而类似于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起步较晚,与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相比,不论是从金融市场规模还是金融产品丰

富程度来讲,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仍有较大差距。

一、文献综述

投入产出分析法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Leontief 为了研究美国经济结构,首次提出并应用了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法主要是通过编制记录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一定期间生产经营活动的投入来源和使用去向的表格,以此为基础来对国民经济中所有产业之间紧密的关联关系进行研究^[2]。基于 Leontief 的不平衡发展理论, Hirschman 提出了产业关联概念以此来判断可以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3]。而中国于 1965 年才开始研究投入产出表,并于 1987 年第一次编制投入产出表,每 5 年编制一次。李秉全率先在国内将投入产出法运用到企业经济活动中以此来分析企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过程^[4]。宋辉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多目标规划模型,丰富了投入产出的方法并由此建立了产业结构与部门发展优化模型^[5]。何德旭等率先将产业关联分析引入到中国金融服务业中,初步分析了中外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差异^[6]。程大中以截面数据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并比较了中国和 OECD 数个经济体之间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结构特征以及发展水平,认为中国与 OECD 经济体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差距更多来自于社会机制、诚信水平和政策设计等^[7]。

多名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比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以及横向比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之间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和影响,结果均显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较低水平^[8-9]。刘晓欣等运用中国编制的 2002 和 2007 年投入产出表,从产业关联度和宏观经济效应变化的角度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中具体产业——旅游产业作了全方面研究分析,得出中国旅游产业前向关联度较弱,相反后向关联度较高,对国民经济有较强的带动作用^[10]。赵春萍等以直接贡献为出发点,探究了金融业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11]。吕鹰飞通过

投入产出法详细阐述了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系,认为金融服务业对国民经济有普遍带动作用^[12]。王磊通过对中、日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金融保险业发展程度滞后于日本,日本金融保险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较为集中,而中国较为均衡^[13]。张永庆等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地区对中国东、中、西部的金融业与国民经济主要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14]。徐盈之运用 PLS 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法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进行进一步研究,认为技术和制度进步可以产生积极作用^[15]。雷原等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 68 家文化创意公司进行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得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16]。倪洪福等利用 1997、2002 和 2007 年 3 个时间的中国省级投入产出数据,率先从区域角度分析了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17]。袁小慧等以后亚洲金融危机时代为背景,结合投入产出法和 Montgomery 分解,率先对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因素进行研究^[18]。吕越等采用双边贸易资料以及 2001 ~ 2011 年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以及其他四十多个经济体的融资约束的影响状况,建议中国推行地区差异化政策^[19]。

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革,金融与经济各部门关系也有了新的特征与关联。李芳等采用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以静态模型分析了中国金融业的产业关联特征,发现金融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瓶颈^[20]。杜金岷等以三阶段 DEA 模型对中国区域科技金融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探究,国内不同省份规模效率差异较大^[21]。江静运用 2002 ~ 2012 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金融保险业以及服务业作了分析,认为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22]。

通过以时间先后为序梳理投入产出法运用的演进,相比其他研究方法而言,用投入产出表分析金融服务业,可以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金融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技术特点及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程度。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最新发布的中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运用修正后列昂惕夫逆矩阵进行计算,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各自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其产业关联,借鉴美国成熟的发展经验完善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

投入产出分析是对经济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研究的经济数量方法,能够对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关系作深刻揭示,产业关联的实质就是产业之间相互需求和供给、技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某部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将通过产业关联关系对其他部门产生波及作用,通常把某部门受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叫做感应力,而把它影响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称为影响力。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发现以往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以往学者在进行分析时,为了追求精确性,大多采用各国编制的投入产出表。由于行业划分标准不一致,容易导致国别比较时误差的产生。第二,以往学者多采用某单一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比较,由于编制工作量的巨大,各国统计局难以发布连续年份的数据,因此各国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仅仅能反映一个时点的产业发展情况,无法反映产业关联的动态变化。第三,部分投入产出表为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考虑到外国生产的中间产品对本国影响不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剔除会导致产生误差。

因此,本文采用 WIOD 中 2007~2014 年的非竞争型中美投入产出表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同时将采用修正公式 $[I-(I-M)A]^{-1}$ ^[23] 计算列昂惕夫逆矩阵,其中, M 表示为进口率,公式为:进口产品/(中间使用合计+消费合计+资本形成总额)。

(一) 公式介绍

1. 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体现为某一部门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每增加一单位最终使用而因此受到需求感应程度,即某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感应度系数为每一个部门的感应度与国民经济平均感应度之比,其公式为

$$r_i = \frac{\sum_{j=1}^n b_{ij}}{\frac{1}{n} \sum_{i=1}^n \sum_{j=1}^n b_{ij}}, i, j = 1, 2, \dots, n \quad (1)$$

式中, r_i 为 i 部门感应度系数, b_{ij} 为直接消耗系数,表示 j 部门每生产一单位需直接消耗 i 部门的数量。该公式的分子 $\sum_{j=1}^n b_{ij}$ 表示第 i 部门对于其他部门的推动力,分母表示经济社会平均推动力或影响力。当 $r_i > 1$ 时,表明该产业的感应度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平均感应度。

2. 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体现为某一部门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即某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影响力系数为每一个部门的影响力与国民经济平均影响力之比,其公式为

$$f_j = \frac{\sum_{i=1}^n b_{ij}}{\frac{1}{n} \sum_{i=1}^n \sum_{j=1}^n b_{ij}}, i, j = 1, 2, \dots, n \quad (2)$$

式中, f_j 为 j 部门影响力系数。该公式的分子 $\sum_{i=1}^n b_{ij}$ 表示 j 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力。当 $f_j > 1$ 时,表明该产业的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平均影响力。

(二) 数据说明

WIOD 对各个国家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进行了统一的划分,共 53 个部门,并且为了更全面的分析金融服务业,根据方远平等^[24]和盛斌等^[25]的部门合并标准,本文在 53 个部门的基础上新合并了一张 9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9 部门具体是:农林牧渔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其他工业,分配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其中方元平将服务业分为4类: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分配性服务业以及社会性服务业,而金融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为了研究自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美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关联连续变化情况,本文选取2007~2014年9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三、实证分析

(一) 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总体水平的对比

服务中间投入率是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与服务总投入之比,可以反映出服务业附加值占总产出的比例,其数值越小,则服务业中附加值比例就会越大,中间投入率和附加值成反向变动关系。表1是中美2007~2014年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对比,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无论是整个服务业还是细分服务业,其相应的中间投入率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均较稳定,没有发生较大的波动;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在2008年有较大的波动;中国金融服务业2007年至2011年的中间投入率均维持在31.03%左右;美国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率2007年为47.74%,2008年增长至54.17%,增长幅度为13.47%,2009年以后又逐渐降低,均值为46.54%。服务业下细分的4种类型服务业中,可以发现中国和美国消费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均最高,中美服务业4个部门中中间投入率最低均为生产性服务业,2007年至201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均值为39.61%,略高于美国的36.69%。对于整个服务业而言,中美两国的中间投入率相对比较稳定,中国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从2007年46.48%降至2014年的46.09%,而美国服务业中间投入率从2007年36.20%增至2014年37.83%。2007年至2014年间,中国的服务业以及服务业细分4个部门的中间投入率均高于美国。通过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整体来说起步较晚,中间投入

率以及发展水平还不如美国,但是中国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率较低,是服务业中附加值较高的产业。

(二) 中美金融服务业产业关联系数的对比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以及调整合并后的投入产出表,通过公式(1)和公式(2),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和部门的各项产业关联系数。

表2为2007年至2014年中美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从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感应度系数还是影响力系数,美国金融服务业均大于中国金融服务业,说明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对其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大于中国。2007年至2014年间,中国与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大于影响力系数,说明金融服务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大于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2007年至2014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同时在此期间感应度系数整体趋势处于上升,感应度系数由1.4214上升到1.7097,累计增长率为20.28%。但是数据显示也发现2010和2011年感应度系数在下滑,这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有关。但是整体上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在53部门中的排名较为靠前,基本维持在第9名和第10名,从数据上看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在逐渐增强。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由2.5158降至2.0643,累计下降率为-17.95%。排名虽从第1名降至第4名,整体呈下滑趋势,但感应度系数均大于2,说明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2007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均小于1,平均值为0.7105,长期处于53部门中的第45位,金融服务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力整体较低。2007年至2011年,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略大于1,2012年至2014年,由于受到欧债严重危机的波及,其影响力系数略小于1,无论是从排名还是影响力系数来说,其变化趋势均呈现出倒U型的特征,说明美国金融服务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力与社会平均水平大致持平,但目前有下降的趋势。

表 1 中美 2007 ~ 2014 年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对比 %

年份	金融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分配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		社会性服务业		服务业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2007	31.02	47.74	39.57	37.32	46.29	35.71	62.28	42.19	50.87	34.73	46.48	36.20
2008	31.03	54.17	40.07	38.59	45.92	38.33	62.29	45.26	50.68	37.38	46.56	38.33
2009	31.03	47.72	39.40	36.19	45.70	33.23	62.34	45.13	50.64	36.68	46.15	36.21
2010	31.03	46.74	39.43	36.32	45.45	36.84	62.32	44.77	50.85	36.93	46.03	37.00
2011	31.04	45.56	39.40	36.10	45.34	38.40	62.33	45.42	51.14	37.32	46.02	37.42
2012	31.04	41.78	39.68	35.68	45.24	38.83	62.34	45.38	51.35	37.17	46.15	37.30
2013	31.04	44.70	39.54	36.54	45.14	38.82	62.35	44.91	51.35	36.94	46.00	37.50
2014	31.02	43.94	39.81	36.82	45.14	39.23	62.36	45.25	51.34	37.27	46.09	37.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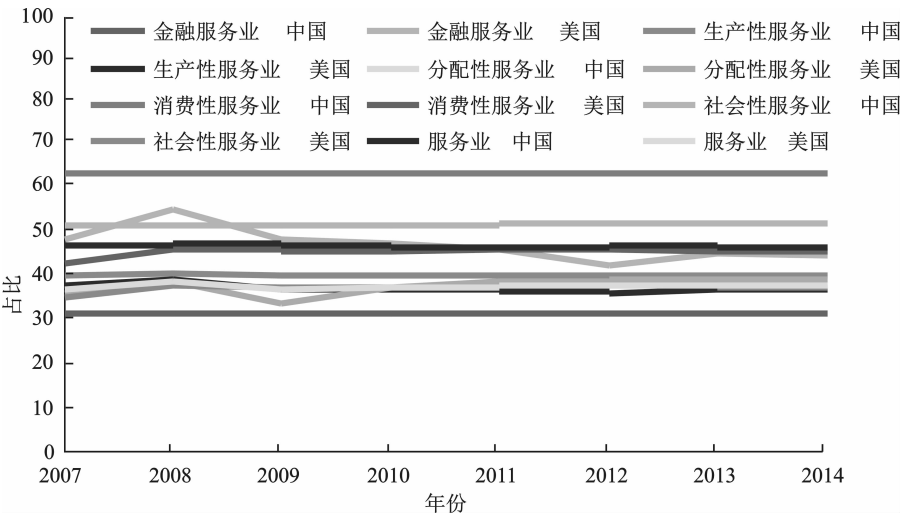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 2007 ~ 2014 年金融服务业中间投入率对比

表 2 2007 ~ 2014 年中美金融服务业关联系数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年份	中国	位列	美国	位列	年份	中国	位列	美国	位列
2007	1.421 4	9	2.515 8	1	2007	0.727 5	45	1.038 4	18
2008	1.466 5	10	2.320 3	1	2008	0.726 9	45	1.090 3	12
2009	1.576 3	9	2.357 5	1	2009	0.709 7	45	1.052 9	15
2010	1.556 4	10	2.204 4	1	2010	0.716 3	45	1.031 2	18
2011	1.538 9	10	2.039 4	2	2011	0.712 5	45	1.006 4	24
2012	1.593 1	10	2.075 2	2	2012	0.705 0	45	0.960 6	28
2013	1.638 7	10	2.075 5	2	2013	0.695 0	45	0.996 4	25
2014	1.709 7	9	2.064 3	4	2014	0.690 9	45	0.981 8	27

表 3 是 2014 年中美产业关联系数对比,由表 3 可知,2014 年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较低,其感应度系数分别为 0.467 7 和 0.507 1,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均接近于 1。就金融服务业来说,其影响力系数超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水平,表明

了金融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 2014 年的服务业中影响力系数较高的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略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其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并不明显。从美国 2014 年 9 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数据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分配性服务业

表 3 2014 年中美产业关联系数对比

产业与部门	中国		美国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农林牧渔业	0.829 2	0.7890	0.840 5	1.096 2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0.964 7	1.185 5	0.725 3	1.105 6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2.228 2	1.198 5	1.436 1	1.154 6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1.068 2	1.239 6	0.781 0	1.048 0
其他工业	1.020 0	1.1352	0.941 0	0.903 8
生产性服务业	0.971 3	0.748 8	1.526 7	0.887 8
金融服务业	1.709 7	0.690 9	2.064 3	0.981 8
分配性服务业	0.943 5	0.790 2	1.133 8	0.916 8
消费性服务业	0.467 7	1.024 0	0.619 3	0.990 9
社会性服务业	0.507 1	0.889 2	0.996 3	0.896 3

注:数据根据中美两国 2014 年投入产业表整理计算。

以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大于 1,其中最高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其感应度系数 1.526 7,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最大,而消费性服务业感应度系数最低,仅为 0.619 3。2014 年美国 9 部门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力系数最低为 0.887 8,表明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WIOD 中 2007 ~ 2014 年中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对中国与美国金融服务业以及整体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做了对比分析,并用列昂惕夫逆矩阵测算了中美两国 2007 年至 2014 年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并对金融服务业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认为:

第一,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可以看出中国金融服务业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虽近年来发展状态良好,但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仍然比较明显,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对于资金融通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应该抓住本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走出去的浪潮,在做好风险控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加快“一带一路”专项债券等相关新型金融产品推广、推动国内债券市场与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市场的互认互通,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

第二,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低于美国,说明中国金融服务业对于关联产业的带动能力较弱,但是其附加值能力高于美国。除此之外,中国整体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均高于美国,说明中国服务业整体发展还落后于美国,中国还需加大服务业投入占比,同时中国可以从美国服务业的结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服务业核心竞争力,带动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进而推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大于中国,说明了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和拉动作用均处于较强地位。由数据可知,中国金融服务业感应度系数以及影响力系数在国民经济 53 个部门中排名在不断提升,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感应度及影响力系数的排名在逐步下降,说明中国金融服务业关联效应大小与美国金融服务业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但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在所有产业中处于较后位置,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金融服务业规模体量已然发展壮大,但是其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反映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现状为大而不强、金融发展方式较为粗放、金融风险未被合理控制等情况,

金融服务业应该“疏通前门,严堵后门”,加强对金融风险较高领域监管力度和深度,落实金融风险终身责任制,同时又要积极引导金融服务业发展趋势,发挥好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满足“一带一路”战略中企业合理需求。

参考文献:

- [1]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M].巴曙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 Leontief W.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 1919-1939: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quilibrium analysis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41.
- [3] 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4] 李秉全. “投入产出法”在钢铁联合企业中的应用[J]. 经济管理, 1979(11): 50-55.
- [5] 宋辉.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产业结构与部门发展模式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04.
- [6] 何德旭, 姚战琪. 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分析[J]. 金融研究, 2006(5): 1-15.
- [7] 程大中.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1): 76-88.
- [8] 李江帆, 朱胜勇. “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与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08(9): 3-10.
- [9] 顾国达, 周蕾. 全球价值链角度下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方法[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5): 61-69.
- [10] 刘晓欣, 胡晓, 周弘, 等. 中国旅游产业关联度测算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基于2002年与2007年投入产出表视角[J]. 旅游学刊, 2011, 26(3): 31-37.
- [11] 赵春萍, 于雪. 我国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中国金融, 2011(16): 78-80.
- [12] 吕鹰飞. 我国金融业投入产出关联及效率分析[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 [13] 王磊. 基于投入产出的中、日金融保险业产业关联分析[J]. 经营与管理, 2012(10): 85-88.
- [14] 张永庆, 金锐, 汪文森. 中国金融产业关联效应与区域地位比较——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J]. 上海金融, 2014(9): 18-22.
- [15] 徐盈之, 郭进, 刘仕萌.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碳锁定与碳解锁路径研究[J]. 软科学, 2015(10): 33-38.
- [16] 雷原, 赵倩, 朱贻宁.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效率分析——基于68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 37(2): 89-96.
- [17] 倪红福, 夏杰长. 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及其与制造业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15, 27(1): 60-72.
- [18] 袁小慧, 范金, 王凯, 等. 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 基于产出角度[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2(2): 73-82.
- [19] 吕越, 罗伟, 刘斌.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J]. 金融研究, 2016(6): 81-96.
- [20] 李芳, 袁天昂. 我国金融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性分析——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J]. 时代金融: 旬刊, 2016(5): 354-357.
- [21] 杜金岷, 梁岭, 吕寒. 中国区域科技金融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分析[J]. 金融经济研究, 2016(6): 84-93.
- [22] 江静. 中国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吗?[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7(1): 27-36.
- [23] 何传添, 廖欢. 中美服务业中间投入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1995~2011年投入产出表[J]. 国际经贸探索, 2016(11): 30-40.
- [24] 方远平, 毕斗斗. 国内外服务业分类探讨[J]. 国际经贸探索, 2008, 24(1): 72-76.
- [25] 盛斌, 马涛. 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 基于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08(3): 12-20.